

[了解伊斯兰文化]

## 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

马丽蓉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摘要:**本研究是从兼顾典籍阐释、案例举要与传媒透视相结合基础上切入阿拉伯—伊斯兰问题被普遍误读这一核心内容,展开关于国际问题的微观辨析与国际关系的宏观把握,力求完成从表达强势文化霸权的国际传媒热点问题研究转向国际传媒热点问题中有关贬损弱势文化的表达研究,从而使社会学的基础研究真正参与并思考国际事务,达到破立并举的双重学术目的。

**关键词:**西方霸权语境;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文化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05)02-0008-10

中东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国际热点问题之一,“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更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加紧推行“强力改造”和“柔性重塑”相结合的政策,已引起了世界的高度警觉和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与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相关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或注重宗教典籍研究却轻视国际政治文化问题的深入探究,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议题;或对西方掌控强势传媒的严酷国际传播现实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学理的回音,未能形成切实的研究理念;或未能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置于国际战略高度作出有分量的学术反应。因此难以形成纵阔的研究视野。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拓殖、战争、传教、迁徙、贸易等方式进行文化的跨域移植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曾经利用战争强制推行基督教文化,遭到被侵略国家的强烈抵抗。后殖民主义者又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帜”利用传媒科技向全球倾销自己的文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既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呐喊助威,更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首先罹遇“灭顶之灾”。这既是由于“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

们必须被别人表述”<sup>[1]</sup>的弱势文化群体处境所致,更是由于西方传媒的霸权语境所鼓噪的敌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种族文化偏见和中东利益驱动所致。因此,本研究力图在对霸权语境的“重塑”表象、文化典籍的辨析与社会现实的真相披露作量和质的双重审度中,完成从表达强势文化霸权的国际传媒热点问题研究转向国际传媒热点问题中有关贬损弱势文化的表达研究,从而使社会学的基础研究真正参与并思考国际事务,最终达到破中有立的双重学术目的。

“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国际传播,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这个国家就实现了某种目的,并能以此为指标来衡量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地位。”<sup>[2](P4)</sup>但是,东、西方传媒发展现状却使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无法在国际上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究其缘由,根本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与阿拉伯—

收稿日期: 2005-03-28

作者简介: 马丽蓉(1966—),女(回族),新疆乌鲁木齐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

伊斯兰国家“软实力”对比的严重失衡。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权)力是指“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它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民族士气和精神、国际形象、国际战略、确定国际体制的能力和科学技术等诸多要素”。国际传播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则又外现为一种“信息权力、一种超越国家范畴但仍作用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力”<sup>[21](P36)</sup>。因此,以美、英、法、德、澳等国传媒与“半岛”、《阿拉伯人》、《金字塔报》等媒体之间的力量失衡极大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国际宣传,严重影响其国际声望,最终导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逐步陷入无言、失语甚至被普遍误读的窘境。

必须承认,当今国际传播媒体主要还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占主导地位。在1999年公布的世界媒体100强中,有95%的媒体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排名前10位的大媒体中就有7家来自美国。全球的传媒业基本由近10个传媒集团所掌控,其中多数为美国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维亚康姆—CBS、贝塔斯曼、新闻集团、西格拉姆、国际通讯技术公司(TCI)、索尼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等。这些传媒集团所控制的国际媒体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系统、电影、音乐唱片、录像带和光碟以及互联网服务等。国际媒体公司的快速发展也促使国际媒体业的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西方国家的媒体凭借其强大资本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力量在其国内已取得垄断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还积极谋取国际传播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最具例证意味的是,2000年1月10日,美国最大的因特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宣布以160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世界第一大媒体公司时代—华纳,新产生的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将成为集因特网、出版、新闻和娱乐于一体的超级媒体王国。此次兼并具有规模大、以小吃大以及新媒体公司兼并老媒体公司等特点,这一震惊世界的超强合并标志着传统媒体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媒体中英语的优势又体现为英语使用国的一种无形优势:据统计,互联网上的信息90%左右以英语方式负载运行,使其他非英语国家进一步被边缘化,使国际传播信息流不断从英语国家流向非英语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权利说且被倾听(The right to speak and to be heard)应该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话语保障。但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仅失去

了“The right to speak”的可能,更失去了“To be heard”的资格。因为,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媒体自身优势语言的高频传布向世界各地不断拓展接受覆盖面,致使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及其消费倾向的全球化,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人文生态构成巨大威胁;在国际传媒领域,占尽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高科技手段负载着的高文化产品,利用信息优势和强大的“软实力”正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地不断输出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及人权等,新布什政策更“要把自由和民主推向世界”。与身处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国际舆论基本也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占主导,并按其价值观来制造国际舆论、垄断主要国际媒体且主导着大部分信息传播的内容与流向。因为西方传媒业无论在数量、质量、覆盖面、信息量,还是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主导地位。亦即,西方媒体能有效设置国际舆论中的议题,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议题很容易成为国际舆论的主要议题。尤其最近10多年来,美国的电视新闻几乎就等于全球新闻。这些新闻报道不但影响非西方国家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而且还会影响或左右这些国家的国际形象、国家利益,甚至国家主权问题。西方媒体散布的“伊斯兰威胁论”乃至“绿祸”论等都与西方主要媒体炒作国际舆论有关。依照传媒依附理论来看,“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的信息和传媒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源于一个‘中心—边陲’的循环体系,即‘边陲’国家传媒体系所以欠发达,是由于其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传媒体系的依附,这些‘中心’国家(多为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传播多数资源,并一直主导着国际传播过程”<sup>[21](P36)</sup>。国际媒体的失衡发展不但表现在国际媒体影响力的强弱上,也反映到与国际媒体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近20多年国际媒体的发展现状表明:当今世界国际传播的总体格局基本是被西方的大型国际性传媒集团所垄断,非西方国家的媒体则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美国传媒试图以信息优势来保持霸权地位,“霸权政治”在互联网上便演变为一种“文化霸权”与“强权政治”等倾向。其他西方国家也不示弱,鉴于互联网上强势英语的传播现实,法国政府宣称要在互联网上打一场“文化战争”。他们决定,凡有关法国信息的主页必须使用法语,并提倡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时也要与法语并用。英国、加拿大等国在抵制美国文化蚕食的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加大了自身文化输出的力度。因此,深受“文化侵略”的则是信息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发

展中国家,其作为民族标志的语言文化符号正失去活力,民族身份的认同正处于“失语”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年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sup>[3]</sup>。掌握着文化输出主导权的第一世界借助强势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第三世界,话语霸权既成事实。而话语霸权则是权力集团通过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使其特定的话语借助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渗透到不同文化群体,让他们在逐步丧失自我意识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从而将一种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认识。西方的话语霸权则将西方的文化价值强行植入不同文明系统的非西方世界而造成压制其他民族自我表达的霸权后果。在全球多民族话语交锋的背后,实为物质利益和传媒力量的竞争,一种传媒秩序的形成,标志着某种话语主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建立。因此,无言状态正说明了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于失语之中。

对非英语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而言,利用因特网接受信息意味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要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在身处劣势的中东媒体中,尤其一提的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其荣辱跌宕折射出阿拉伯—伊斯兰媒体的共同命运。据在线杂志品牌频道(BRANDCHANNEL)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以报道伊拉克战争和独家披露国际恐怖组织内部资料著称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意外地被评为2004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第五大品牌。品牌频道总编罗宾·鲁施认为,“半岛”电视台这次被列为第五,因为它是少有的能提供不同观点的新闻来源之一,“很多人想了解关于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战争的新闻,然而主要的新闻源都带有西方偏见。人们观看‘半岛’电视台,看它的网站,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sup>[4]</sup>。在阿富汗战争的新闻战中风头盖过CNN等西方著名新闻媒体的“半岛”电视台也因此打破了美国媒体的话语垄断,终于向世界发出了阿拉伯民族自己的声音,受到阿拉伯人民的普遍欢迎。但是,有资料称,“半岛”电视台至今无法实现自负盈亏,卡塔尔政府每年还要补贴上亿美元。所以西方学界把“半岛”电视台定性为一家由政府间接所有的媒体。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半岛”电视台虽然名满全球,但一直是赔钱赚吆喝。不仅如此,美军又曾几次“炮轰”“半岛”:2001年11

月,“半岛”电视台驻喀布尔总部被美军炸弹摧毁;2003年4月2日“半岛”电视台设在巴士拉的新闻报道总部、一家宾馆当天上午遭到轰炸,所幸没有造成伤亡。虽然卡塔尔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盟友,向美国提供了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但两国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其主要原因就是卡塔尔政府资助的“半岛”电视台经常充当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反美武装力量的媒体喉舌,尤其成为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信息的权威发布者。据美国媒体披露,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卡塔尔最近已打算让步,将“半岛”电视台转手出售。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媒体的境遇遭际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以“半岛”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媒体在资本、人才与技术等规模、语言普及与覆盖以及统领国际舆论的可能性等方面均与西方媒体难相匹敌,终致待价而沽,实属被逼无奈。虽然美伊战争让人们领教了虚假新闻的随意传布,但“半岛”电视台毕竟又为我们掀开了西方传媒霸权话语冰山的一角。于是,西方国际性媒体在世界非西方地区的受欢迎程度(收视率和发行量)正在不断下降,一些本土化的媒体在本地区反而越来越受到欢迎,有些还一跃成为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本土化媒体,如卡塔尔的“半岛”、中国的“央视”等。可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对非西方话语兴起而使西方霸权话语渐受威胁的一种担忧,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全球的西方认同,以维护西方文明话语制约下的国际秩序。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媒体就是要全力抵抗这种“通过文化宣传和渗透,使国外知识分子、政界要人和民众产生文化认同和政治共鸣,从而影响其内外政策”<sup>[5]</sup>的文化帝国主义。

质言之,大体梳理东、西方传媒发展现状,尤其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媒与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媒体间的失衡发展现状的悬殊对比中展开分析,发现:失衡的传媒现状自然产生了迥异的传媒影响力,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因为,传媒影响力实为“一种控制能力,表现为影响力的发出者对影响力的接受者在其认知、倾向、意见、态度和信仰以及外表行为等方面的控制作用。传媒影响力是通过信息传播过程实现的,它是以受众关注和接触传媒内容为前提,并最终导致受众行为改变的过程”<sup>[21](P112)</sup>。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也认为跨国媒体集团对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媒体产品(包括传播技术)主要从中心国家流向边陲国家并以此控制边

陲国家。同样,西方媒体产品因其固有的侵略性而对当地文化产生负面影响,造成非西方国家的受众被动接受西方媒体输出的大量信息,这些国家的政府基本无法抵挡西方强势传媒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显然,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不过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隐蔽罢了。可以说,西方传媒凭借优越的物质传播基础和强势的传播流程造成了无法匹敌的传媒影响力,从而彰显出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

## 二

中东问题专家、新华社常驻中东资深记者马晓霖指出,“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尽管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同情和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的,但是,中国的青年人,特别是青年网民已经大部分站在了以色列一边”,出现这一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和中国当代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发生剧烈变化有关,与西方媒介控制和左右世界信息渠道有关,但也与阿拉伯国家对外宣传不力,尤其是对华媒介公关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建议“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都应该学习以色列的媒介公关意识和技巧,反思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他认为,以色列在华媒介公关谋略和技巧主要包括“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驻以色列和中东地区记者交朋友,使其在到达以色列前就对这个国家产生亲近感”;“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媒介负责人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并长期保持联系,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以色列在中国的院外集团”;“通过外交官的广泛社会活动,大量接触中国各阶层,频繁在中国媒介中曝光,树立国家的形象”;“追踪媒介报道,并进行适当交涉”;“资助学术研究和出版活动”等诸多方面。而“以色列政府邀请国际著名公关公司为其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已经不是秘密”<sup>[6]</sup>。同样,美国也一贯重视对外宣传,深谙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独特作用。就美国的根本政治利益而言,美国的媒体从来就不是高于政治,而是为政治服务,甚至与政治构成互动关系。“9·11事件后,美国媒体所表现出的空前一致,引发了人们对媒体在美国社会政治中作用的思考。在素以平等、自由相自诩的美国,政府虽然不会直接干涉传媒,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动用各种手段来制约媒体的报道。“9·11事件后更以“反恐”和“安全”为由,加强了对传媒信息传播的管束。对此,连美国国际新闻研究所所长弗里茨都认为,“‘9·11事件后,美国新闻自由的环境恶化了,美国媒体正越来越受

到政府的控制”<sup>[21(P188)]</sup>。美国在中东的“袒以压巴”以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发动的战争等激起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普遍“仇美”情绪,美国政府不但专门成立相应的对策机构,重点解决“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恨我们”的问题,而且加大了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公关性宣传。“9·11事件后,美国更是连续发动了一系列的宣传攻势:在“9·11事件发生的一周内,美国各主要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播出,24小时不间断地播出现场报道和访谈。在政府尚未就“9·11事件正式表态之前,诸如“袭击美国”、“对美国宣战”、“美国的新一轮战争”等煽动性的舆论主题词充斥于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种步调一致的战时宣传为政府发动“反恐”战争提供了心理基础和民意支持。结果,在美国媒体每天24小时的“新闻轰炸”下,主战派在公众的观点中占了上风,对布什的支持率更是一路攀升。在“9·11事件中,美国主流媒体代替政府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宣战,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美国总统布什还于2003年1月21日签发总统行政令,专门创建全球传播办公室(The 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s)。“该办公室旨在把总统的意图融入美国国际传播计划并协调美国的长期战略,向世界各国受众传递美国政府的声音,最终为美国赢得有利的国际舆论(如反恐等活动)”<sup>[21(P17)]</sup>。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国际传播史就是一部国际传播中政治化倾向加剧史、一部西方文明对异质文明的改造史:世界上第一个开办国际广播的国家是荷兰,它从1927年起用荷兰语向东印度等殖民地进行广播,随后又增加了英语和印尼语广播;1929年,苏联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开办了德语对外广播节目,德国电台立刻加以干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交战国除了开展地面战外,还在空中展开电波大战。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把广播作为宣传工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并认为“谎言重复千遍也会变成真理”,大肆编造虚假新闻,开展“广播大战”。结果到二战爆发时,纳粹德国播出的外语节目最多,共用26种语言播出,其次为盟国意大利,用23种语言播出。这足以说明“国际广播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国际传播政治化,使国际传播变成一种能达到政治目的的新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传播这种政治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国际传播(或国际广播)就等于国际宣传”<sup>[21(P17)]</sup>。斗争双方是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轴心的法西斯国家和以苏联、美国和英国为主的反

法西斯国家;冷战时期,国际传播间的斗争双方很快转变为以苏联、东欧、中国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以美国、西欧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传播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宣传和资本主义宣传的对峙为特征,政治性依然十分突出,基本上还是政治宣传的工具。“美国之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始终一马当先;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传播逐步进入多元化时期。在“一霸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所增加的政治变数又为国际传播的多元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经济因素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信息的全球化,电视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报道最能体现电视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CNN就因直播1991年的海湾战争而一举成名。“在海湾战争期间,西方联盟把伊拉克行为定性为‘萨达姆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对抗’,并通过国际媒体使这一定性变得‘合法化’。美国通过国际媒体的宣扬和渲染,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并对伊拉克出兵。”<sup>[21](P114)</sup>掌控海湾战争70%新闻实时报道的CNN为此功不可没且声名鹊起,成为国际新闻报道的首选电视频道。如果说1991年海湾战争成就了美国的CNN的话,那么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则使卡塔尔的“半岛”一战成名。所不同的是,身处弱勢的“半岛”有名无实,举步维艰。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能有效控制国际舆论及其传播,这些媒体在一定条件下有时甚至会偏离新闻职业道德为其所依附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而不惜歪曲事实、制造假新闻,2003年的美伊战争就是如此。客观地说,美伊战争的交战双方都认识到了国际媒体对战争的重要性。美国方面拼命控制国际媒体,以掩盖战争真相,结果连《纽约时报》这样的国际性大报都出了假新闻事件。伊拉克方面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也采取了种种手段,即使当美军已经攻入巴格达,前新闻部长还在向国际媒体发布不实之词……美伊战争,给人的感觉恐怕是交战双方的军事战还不如战争初期的传媒战更为深刻。再加上美伊战争后期又爆出的“虐囚”丑闻和近日披露的“萨达姆被俘录像是假的”等,将西方媒体的可信度降到了冰点。西方传媒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全球化等重大国际事务的考验,始终坚持既为殖民宗主国的霸权利益服务,又要不断参与异质文明的改造和重塑。只可惜,美伊战争却令西方传媒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正是西方传媒长期推行霸权话语的必然结果,表明仅有强势的传媒方式与霸权话语的传媒内容却丧失了传媒的可信度,终会

适得其反,咎由自取。因为,可信度才是传媒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更何况“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国际传播中的文化交流既可增进理解、消除误解,也能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因民族、宗教和文化等差异而诱发的冲突和事端将会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中的常见现象。

尽管阿拉伯国家普遍不太重视对外宣传,但是,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思想家们却为纠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被丑化作了许多切实的努力:如2001年11月,举行了阿拉伯文化人的思想大会;2001年12月,举行了阿拉伯国家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长会议;2002年4月,举行了阿拉伯新闻论坛;2003年12月,阿拉伯作家协会在开罗举行题为“阿拉伯文化与前景”的会议……更值得一提的是,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虽处境艰危,但其作为非西方媒体的崛起经验却不容置疑:“它能顶住压力,坚持客观、公正、独立、全面、平衡的报道方针”;“阿富汗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正好符合了其本土化要求,既可突出其阿拉伯报道视野,也可以利用‘本土化’的伊斯兰优势”;“政府的充分支持”——经济上,卡塔尔政府对它的投资金额达1.3亿美元,这笔金额可以使电视台运作5年而无任何经济后顾之忧;人才方面——电视台建立初期,就从英国广播公司(BBC)招募了一大批阿拉伯语编辑、记者以及技术人员,他们带来了英国BBC及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电视节目的制作理念,从而保证了该台的节目质量;卡塔尔政府又给予该电视台极大的自由——“在阿拉伯世界对新闻媒体严加控制的大环境下,半岛电视台是唯一一家能够不经当局新闻审查而自主播出新闻节目并发表评论的电视台。自从该电视台创办以来,曾因其客观、全面、平衡的立场而得罪了多个国家、机构及政要,这些国家和机构都先后向其提出抗议,要求卡塔尔政府管制半岛电视台的行为,但都被拒绝。由此可见卡塔尔政府是给予了该电视台罕见的充分、完全的自由,使半岛电视台得以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它的足以同西方媒体相媲美的声誉”。不过,“半岛”最终也难免被西方媒体不断排挤的可悲命运,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然而,“半岛”成功的启示是显见的:“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国际传播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要解决国际传播领域的不公正、不平衡状况,必须依靠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努力,不可能指望西方发达国家会主动改变现状”;“发展中国家媒体本身应学习

西方媒体的长处,利用、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自己的素质,才能在国际传播中发出更多非西方的声音。<sup>[21]</sup>(P168-170)“半岛的成功经验足资非西方媒体借鉴,美国穆斯林的“公共形象”维护方略更值得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自省:美国穆斯林一直为改变身陷霸权语境核心而日趋恶劣的“公共形象”作了不懈的努力:“纠正教科书里有关伊斯兰史的一些错误,改善电视节目里的穆斯林形象,举办伊斯兰问题研讨会”;活跃于政界和军界力图“融入主流社会”;用投票、抗议等方式“努力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经过如此努力,“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及公共形象得到了象征性提高”,但欲使“决策者作出实质性努力去更多了解伊斯兰教及其相关知识,促进美国人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有更多的了解、宽容、接受,减少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偏见和歧视行为”<sup>[7]</sup>,还任重而道远。不过,经过他们一代代的不懈努力,《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乃至 CNN 等国际媒体也出现了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少量客观报道,表明美国穆斯林的积极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质言之,与以色列、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对外宣传相比较,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绝非不重视国际传播,而是无实力重视之。因为,自从约瑟夫·奈提出“soft power”这一概念后,软实力和硬实力日趋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双重指数,在信息时代后者甚至比前者所发挥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有效,奈在“9·11”事件发生后推出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一书里更加强调整软实力的重要性,告诫布什政府与霸权和单边思想相伴生的傲慢将会毁掉本可以成为解决之道的软实力,伊拉克战争所强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仇美”情绪的极端宣泄更证明了约瑟夫·奈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西方强势传媒之所以能不断边缘化非西方传媒,就是恃凭其强大硬实力所致的发达传媒科技力量。但是,非西方传媒若能始终坚守新闻的可信度并充分利用本土文化的资源优势乃至受众体的人数优势等,也能在国际传播的媒体比拼中大有作为,“央视”成功报道美伊战争就是最有力的明证。

### 三

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最终导致与阿拉伯—伊斯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均程度不同地陷入被国际受众体普遍误读的泥潭。这主要是由西方传媒的国际传播政治性这一核心特征所造成的。亦即,与殖

民宗主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政治、经济利益的强行攫取相配合的是西方传媒对此世界由殖民到后殖民性的“柔性重塑”。

一般而言,国际传播政治性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公开的和隐性的两种:“公开的政治性国际传播一般由政府资助,如美国之音。它们代表政府的观点,或该国对世界事务的看法”。“隐性的政治性国际传播往往是一些非政府资助的信息交流,如电影、音乐、教育等文化类节目”<sup>[21]</sup>(P32)。西方传媒则兼顾两种方式进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塑”。正如著名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朱威烈先生所指出的:“19世纪那种殖民主义模式——为使欧洲人在商业上获利,必须使东方国家重新恢复政治秩序,到21世纪前后又一次甚嚣尘上,使超级大国的决策者、传媒的眼光一下子转向了东方,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在阿拉伯、伊斯兰中寻找并设定‘无赖国家’和‘邪恶帝国’了,伴随这种政策导向的,是西方的影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中充斥着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或阿拉伯和暴力,或东方和专制等同起来的负面的定型形象。”<sup>[8]</sup>西方媒体塑就这一“负面的定型形象”的主要表现是:“在影视作品中,阿拉伯人要么与好色要么与残忍和不诚实联系在一起。他被描述为这样一副形象:因过分纵欲而颓废,善于玩弄阴谋诡计,有着施虐狂的本性,邪恶而低贱。奴隶贩子,赶骆驼的人,偷兑外币者,游手好闲的恶棍:这些是阿拉伯人在电影中的传统角色。”“在新闻电影和新闻图片中,阿拉伯人总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没有个性,没有个人特征或个人经验。大部分画面表现的是群体的愤怒和苦难,或非理性(因此也就具有无可救药的怪异性)的行为。在所有这些形象后面隐伏的是伊斯兰圣战的威胁。”<sup>[9]</sup>有关伊斯兰和阿拉伯的书籍和文章一成不变地沿袭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强烈的反伊斯兰情绪。甚至“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1975年为本科生开设的阿拉伯语课指南说,这一语言中每一语词都与暴力有关,阿拉伯语可以‘反映’出阿拉伯人头脑中顽固的好斗性”<sup>[9]</sup>(P367-368)。而“拉什迪事件”更将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偏见与种族歧视暴露无遗: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因创作亵渎伊斯兰教的小说《撒旦诗篇》引发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示威、声讨、查禁与焚书,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520万美金追杀拉什迪,霍梅尼的判决得到了伊斯兰教会议组织46个成员国的确认,欧共体12国却为此召回驻伊朗外交使节。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极度愤怒,英国政府

既授予拉什迪 1988年度“怀特布莱德”文学大奖,又与伊朗断交,并派特警终日保护拉什迪。克林顿总统甚至于 1993年 11月还在白宫接见了拉什迪……可见,这桩围绕着一位小说家的命运所引发的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的罕见案例极具言说价值,其国际问题的例证意味尤其耐人寻味。

其实,西方传媒从方方面面塑造的这个“负面的定性形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想象化、类型化、丑恶化、妖魔化、恐怖化的演绎轨迹,从 19世纪的殖民主义者到 21世纪的后殖民主义者均程度不同地参与并不断营构着阿拉伯—伊斯兰问题逐步陷入被普遍误读的泥潭。

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最初想象是建立在沙漠游牧民族这一基点上的。但二次大战后,西方人心目中的阿拉伯民族是“从骆驼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粗略模糊的原型形象变成了代表着无力与易败的漫画式形象:这就是人们对阿拉伯人的全部想象”。更为不幸的是在“阿以战争之后,阿拉伯人的形象再次发生了变化:显得更具威胁性。卡通中不断出现阿拉伯酋长站在油泵后面的形象。然而,这些阿拉伯人显然具有‘闪米特人’的特征:显眼的鹰钩鼻,邪恶的斜睨神情,显然意在提醒人们(那些非闪米特民族的人)注意,‘闪米特人’是‘我们所有麻烦——就此而言,主要是石油短缺——的内在根源’<sup>[9](P366)</sup>。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对欧美一个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权力、学术和想象体系如何看待中东、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方式所进行的研究”<sup>[9](P423)</sup>的话,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则在强调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这种“创造性或解释性的伟大想象”也是“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一部分”<sup>[10](P17)</sup>。因为,这种静态中的审美表述遮蔽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潜在能力和历史过程,导致文化形象沦入臆想、甚至类型化之中,由个体形象的人物出场到群体充塞的场景描述,甚至将反犹太主义的个体目标置换为排阿主义的群体对象;导致丑化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巴以日趋激烈的冲突和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如果说阿拉伯人引起了人们足够的注意,那也只是作为一种负面的价值。他被视为以色列和西方的扰乱者,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被视为 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障碍——不过这一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西方殖民者偏执地认为巴勒斯坦人无历史、无文化、无土地甚至无民族可言,只配被视为“犹太人的影子”。西方不但在巴以问题上如此偏执,能源问题上更是不可理喻。

在他们看来,阿拉伯人能向人们供应石油这一价值仍然是负面性的。“阿拉伯尽管拥有如此巨大的石油藏量但却缺乏恰当的道德约束。一旦撕下委婉含蓄的惯有面纱,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像阿拉伯这样的民族有什么权利让西方(自由、民主、道德的)发达世界受到威胁。这类问题背后常常暗含着这样一种想法:用海军陆战队占领阿拉伯的石油。”<sup>[9](P367)</sup>

于是,在“东方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电视、电影和所有媒体资源都将信息塞进越来越标准化的模式之中。就东方而言,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 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人们把握近东的方式上。有三个因素导致人们将阿拉伯和伊斯兰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高度政治化,把一潭清水搅得浑浊不堪:第一,西方流行的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偏见,这直接反映在东方学研究的历史之中;第二,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及其对美国犹太人与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以及公众的影响;第三,由于不存在任何文化特定的立场,人们既可以以认同的姿态、又可以无动于衷地谈论阿拉伯或伊斯兰”<sup>[9](P34-35)</sup>。这种“妖魔化东方”的政治、历史、文化乃至学术倾向便渗透到大众传媒的方方面面:西方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简单粗暴地加以表述并制作出大量的反映愚蛮的赶骆驼的人、恐怖主义者和盛气凌人的阔酋长的电影、电视节目等,借此向人们不断灌输由发达的传媒技术所塑就的纵欲、懒散、宿命论、残忍、堕落和壮观等影画形象。美国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更有着惊人的种族主义偏见,肆意把他们都刻画成恐怖分子或残暴的酋长,西方人只适于在那里捞取好处或进行战争。好莱坞大片中妖魔鬼怪般的阿拉伯人形象就是最有力的明证;自从苏联解体后,西方传媒自然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在东方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邪恶帝国。其结果是,各种媒体中到处充斥着欲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由妖魔化推入恐怖化的明显倾向。尤其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炮制和“9·11”事件的发生更起了促动作用。亨廷顿认为“西方面临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但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认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而这些正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

的根本因素<sup>[11]</sup>。就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断为美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鸣锣开道之际,“9·11”事件的发生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妖魔化倾向向恐怖化倾向演绎的进程。因为,“9·11”事件不仅促使美国政治思潮走向了极端化,还使西方传媒所鼓噪的“伊斯兰威胁论”甚嚣尘上,更使美国媒体越来越受制于政府。为此,美国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战时公共信息监控室”的特殊机构,负责协调并监控布什政府每天向国内外发布的各类消息,以确保传媒能准确理解布什的想法和政策。“9·11”事件后,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相关话题更被蒙上了恐怖的阴影,为美国的“大中东”战略的出台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更何况,“欧洲对伊斯兰的兴趣并非来自好奇,而是来自对伊斯兰这个一神论的、在文化上和军事上都令人生畏的欧洲基督教的竞争对手的恐惧”,这种“恐惧与敌视相混杂的情感一直延续至今”<sup>[9](P441)</sup>,自然会影响到美、英等国媒体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报道立场与表述方式。

可见,从二战前—二战—冷战—全球化时代,西方传媒历经想象化—类型化—丑恶化—妖魔化—恐怖化的演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持久过程,或公开或隐形地在长达近百年的传布实践中“重塑”了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相相去甚远的一个臆设形象。这一“负面的定型形象”必须进行改造,“整合”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美国对中东“整合”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利用美国的民主与自由价值观改造长期以来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的中东国家。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想在中东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企图改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便成为国际战略态势中的一个新走向。但是,阿拉伯人创立了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又反过来促进了阿拉伯民族的发展,阿拉伯民族思想和伊斯兰思想密不可分,互为因果。因此,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施压、诱拉与意识形态渗透的“大中东”战略,尤其是假借“反恐”名义的民主干涉与政权更替,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穆斯林的历史和文化自尊,还因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的传出,激起国际社会对美国一向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广泛质疑。正如美国凯托学会国防政策研究室主任查尔斯·佩纳在2003年10月30日发表的题为《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个错误的提法》一文中所指出的:“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干涉主义对外政策的结果。这种反美情绪滋长成

对美国的仇恨。而仇恨变成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动的基石。”“在21世纪,美国越是少干涉别国的内政,美国和美国人民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的可能性就会越小。”<sup>[12]</sup>但事实是,美国政府不但强力推行“大中东整合”战略,美国媒体还为之呐喊助威且凸显出霸气十足的话语风格,这是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长期“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言语积累的结果之一。尤其在“9·11”事件后,美国媒体高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政治语汇,如“反恐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先发制人”、“邪恶轴心国”、“文明冲突”、“恐怖分子”、“大中东战略”等正式进入美对外政策话语系统,逐步取代了旧的对外政策模式中的语言表达,此类话语帮助美国霸权者阐释并建构着“9·11”后国际新格局、世界安全新现实乃至国际传媒的舆论导向等。当然,与之相应的也出现了对抗霸权话语的新的政治语汇,如“圣战”、“人体炸弹”、“虐囚”、“马赫迪”、“反美武装力量”等也不断出现在非西方传媒上,力图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摆脱霸权话语统治下的“失语”窘境。但是,面对西方强势传媒咄咄逼人的霸权话语传播,阿拉伯—伊斯兰媒体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上西方民众对伊斯兰教及其知识缺乏常识性了解,媒体报道自然成为他们获得相关知识的主要渠道,但西方媒体中又处处流露出反伊斯兰的观点,媒体人总倾向于将伊斯兰教与犯罪行为及“原教旨主义分子”甚至恐怖主义简单挂钩,而断章取义地引述伊斯兰教义,更将国际受众体引向了误读的泥潭。这种霸权的负面性的媒体报道,不仅影响了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不少执法部门官员对穆斯林民众的偏见性公务处理,还影响到西方影视、出版、学术等行业偏激的表述与评定。且不说英国对“拉什迪事件”的粗暴处置、美国好莱坞电影对穆斯林形象的消极塑造等,尤其严重的是,西方媒体还一直贩卖“专业水平”的有关中东的学问,竭力宣扬“阿拉伯人只懂得武力;野蛮与暴力是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伊斯兰教是一种不容纳他人的、种族隔离主义的、‘中世纪的’狂妄的、残忍的、反妇女的宗教”<sup>[10](P422)</sup>。结果,西方霸权语境中所有的讨论文字、框架、背景都受到这些思想的限制甚至定性。CBS知情人伯纳德·戈德堡在揭露美国媒体因普遍和巨大的偏见而肆意歪曲新闻时尖锐地质疑:“当电视报道‘9·11’事件的时候,他们并没增多有关中东弥漫着仇恨美国的气氛的报道。(这不是能解释一个阿拉伯孩子是如何成为自杀炸弹的吗?)”“难道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流行的仇

恨美国的态度不是更直接地影响到那些驾驶舱里的劫机犯吗?这是媒体必须严守“政治禁区”所致,“哪怕仅仅是猜测暴力活动是否与伊斯兰教有关的问题也是绝对禁止的”<sup>[13](P213-214)</sup>。媒体除政治、宗教等偏见外,还有种族偏见。最明显的就是阿拉伯人因达不到西方文明的标准常遭西方媒体的冷落,以色列人却深得西方媒体的宠爱。但是,西方传媒对有关阿拉伯人“恐怖活动”的报道却乐此不疲,极尽歪曲之能事。于是,西方传媒的霸权话语体系中滋生出被放大的“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形象所带来的恐怖感弥漫于世界各大媒体,逐步演化为一个国际化或超国际化的恶魔形象,逐步引领了国际媒体的话语导向及其社会话语的立场态度。而“公众对媒体运作的有限影响,加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政府政策与左右新闻报道和选择(由公认的专家与媒体经营者共同制订的议程)的意识形态的配合,使得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帝国主义态度保持了连贯性”<sup>[13](P459)</sup>。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在“9·11”事件发生后变得更加强硬和专断。如果说,在“9·11”事件后的反恐之战中,美国媒体用非敌即友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而主导全球反恐这一国际舆论的话,那么,“美国主流媒体发表的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对策性论文,也是具有明确政治思想支撑和政治观念主张的,也明显地表现出极端化的特点。《华尔街时报》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明确声称,“只有殖民主义才是治理恐怖主义的良方灵药”<sup>[14]</sup>。惯以“新闻自由”相标榜的美国政府也加强了对传媒信息传播的管制与约束,不仅召开密集的吹风会和新闻发布会,还提出了许多要求和告诫,尤其告诫媒体不要播放本·拉登的讲话,不要播放美军战俘画面等,更没有放松对“美国之音”的政治性要求,“9·11”事件后“美国之音”就因播放塔利班领导人讲话,台长被撤

换……美国传媒霸权语境中所炮制的“伊斯兰威胁论”已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各大传媒上不断滋萌和蔓延,随着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整合”步伐的加快,美国传媒对国际传媒的霸权话语影响也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二者互为表里。国际传媒与国际政治的如此契合也将阿拉伯—伊斯兰问题引向了国际关系的核心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前沿。

事实证明,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的基本认知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国际传媒的新闻报道,尤其是那些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国际传媒。因此,西方主流传媒对此问题的确认与传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它们既可充当一般传播中介的角色,还可对此问题起一种“定型”甚至“定性”的作用,其报道的议题和方式都会影响国际舆论和国际受众体对此问题的评价和定位。无论如何,一个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必然是拥有公信力的国际媒体。只有赢得了受众体的普遍信任,才有传媒广泛影响力可言,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西方强势媒体所鼓噪出的“伊斯兰威胁论”乃至“绿祸”论正是其在“重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使然,表明西方传媒可信度的惊人缺乏缘自霸权主义统摄新闻的可怖事实。尤其是美伊战争让人们充分感受并认识到一些国际媒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惜制造虚假新闻的丑恶行径。因此,西方传媒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更值得进行正本清源性研究。正是由于长期遭遇被误读的缘故,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阿拉伯—伊斯兰问题日趋陷入“反恐”与“霸权”的国际根本问题中而成为全球热点话题,更成为国际学术的前沿课题之一。

在普遍被误读的认知与接受的怪圈中探寻何处失真、如何臆造、表现特征、原因规律等诸如此类的具体问题将是以后陆续要解决的议题了。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2] 郭可. 国际传播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3] 阿尔温·托夫勒. 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 [4] 青岛早报,2005-02-01
- [5] 阮建平. 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J]. 现代国际关系,2003,(5)
- [6] 马晓霖. 中国媒体中的沙特阿拉伯形象[J]. 阿拉伯世界,2005,(1)
- [7] 方金英. 美国穆斯林族群命运初探——《美国穆斯林》介评[J]. 现代国际关系,2004,(9)
- [8] 朱威烈. 《当代中东国家社会与文化》总序[J]. 阿拉伯世界,2002,(4):4-5
- [9] [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 [10] [美国]爱德华·W·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 [11] 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12] 安惠侯. 美国中东政策的成败得失 [J]. 国际问题研究, 2004, (2).

[13] [美国] 伯纳德·戈德堡. 偏见: CBS知情人揭露媒

体如何歪曲新闻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14] 任剑涛. “9·11”事件后美国政治思潮的极端化倾向 [J]. 国际政治, 2003, (3).

## Studies on the Arabia-Islam within the Western Hegemonic Context

MA Li-rong

(Institute of the Middle Eas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This research turns into this core contents that is Arabia-Islam problem was widespread misread from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give attention to explain th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list main points of the case and see through with media to combine together, launch a concerning microcosmic discrimin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oblem and macroscopically confi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rive hard to make complete the studies from the expressing the hot problem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of the strong cultural hegemony to the relevant derogatory weak cultural expression of the hot problem of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consequently make the basic studies of sociology to really participate and consider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 and obtain the dual academic purpose that break and raise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the Western Hegemonic Context; Arabia-Islamic Problem; Cultural Imperialism

责任编辑: 李有智

· 新书讯 ·

### 《宗教与民族》(第三辑) 出版发行

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所承办, 著名宗教学家牟钟鉴教授和民族问题专家赵学义研究员主编的《宗教与民族》(第三辑), 近日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辑共收录了 23 篇文章, 有“理论探索”、“专题观察(西道堂观察)”、“历史回顾”、“田野采风”、“他山之石”、“热点透视”、“新秀沙龙”、“书评”以及“八方信息”等栏目。其中《高度重视当代世界民族宗教问题》一文,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中央党校著名宗教学家龚学增教授所写, 高屋建瓴, 具有学术远见和学科前瞻性。此外, “专题观察(西道堂观察)”专题中, 共刊发了马逢春先生、高占福先生、吕大吉先生、牟钟鉴先生、张践先生、宛景森先生和宋玉先生关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的研究和调查文章共六篇, 同时还有葛壮先生的《20 世纪后期国内对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综述》、韩剑英的《论以巴冲突中的宗教因素》等与伊斯兰教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章, 令人耳目一新。

该专辑 32 开, 约 26 万多字, 定价 28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宗教研究所,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68933634。